

胡适经典论丛
Hushi Jingdian Luncong

胡适

论教育

季

蒙谢

泳一选编

Hushi Lun Jiaoyu



Hu Shi / 胡适经典论丛
Jingdian Luncong

胡适

论教育

季 蒙 谢 泳 / 选 编
Hu Shi Jun Chaox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论教育 / 胡适著; 季蒙, 谢泳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7

(胡适经典论丛)

ISBN 7-5336-4767-X

I. 胡... II. ①胡... ②季... ③谢... III. 胡适(1891~1962)—教育思想 IV. 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115 号

选题策划: 唐元明

责任编辑: 唐元明

装帧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 000

定 价: 2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822632

邮 编: 230063

导 言

有人说胡适是现代孔子，其实这话是不必的，是胡适已经足够了。无可讳言，如果二十世纪真要推举一位代表人物，这人多半是胡适。胡适的思想域度很广，教育思想是其中一方面。由于篇幅所限，胡适关于教育的文字不能尽选；加之胡适的教育主张无处不在，很难机械切割，所以文选就成了某种象征意义的东西。而且任何文选只能代表编者个人，好在这些是现代社会游戏规则所允许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引起读者共同阅读的兴趣。

胡适的思想概括起来其实很明白，就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学问上——科学方法。他的教育思想，无不以他的哲学思想为依托。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个国家还有太多的初步的工作需要做；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什么基础，也是在前人的惨淡经营下造成的。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能理解胡适的教育文字。也就是说，“开头”本身乃是胡适这一代学人的宿命，我们根本不能苛求前人留给我们怎样现成的东西，何况他们已经给予得多多。由此，我们在对待过去的一个世纪时，态度上才可能洗尽烟火气。

胡适引杜威的话说：“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的信条。也是从这里来说，胡适的文章大都有一种

国人教育的意味。简言之,教育即是生活,就是要推进一种普遍的平民主义的教育。这与胡适预备为国人导师是一致的,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引过易卜生的话,认为把自己铸造成器就是最大的爱国和对社会负责。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适确立了他的不朽观。概言之,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仅有一次的生命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建设性的、可以流传下去的事业。从而达到不朽,真正的不朽。

胡适的教育文章今天看来仍有切实的意义,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学制和具体教学活动的,比如《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的论文是《韩退之传》,胡适对这篇论文的总体评价是功力甚勤而识力不足。这就关系到史与识的问题,因为见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具备起来的,所以胡适明确说“此病不易医也”。在今天这些仍然是直接的问题,比如研究生做论文。有的高校教师提出干脆免去一定要写论文的硬性规定,因为研究生阶段能够有一些实在的积累就不错了。像硕士论文要两万六千字以上,博士论文要五万、八万以上,等等,只会造成一些应付性的东西。这不是小事情。关于韩愈,陈寅恪的研究论文是有代表性的;陈先生的研究成绩胡适也提到了。并且指出,韩愈研究这样的题目本来就不算偏僻,如果再无所发明,成功率便很低了。这都是中肯的意见,现在还有针对性的参考价值(当然首先是文科)。多看民国时代学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可以很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颇能代表他的思想主张,因而十分重要。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代表,胡适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对此不能说胡适没有自豪感。但是他指出,北大在世界大学之林却是个小弟弟。因为欧洲的大学都有一千年、八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大学只有几十年。古语说得好,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大学既为西方学制,注定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排到世界的前列,因为这里

面有一个尊重先者的问题。胡适也谈到,北京大学是太学的正式继承者,而太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北大不愿意承认这个,北大有北大的志气。在胡适的叙述中,北大是伴随国难成长的,胡适对这所大学的寄托显而易见。对照他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篇文章中谈过的,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胡适说:“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样战略的考虑,当然不会不包括北大在内。胡适关于教育建设与革新的构想有许多条,我们可以看原文,这里就不赘言了。要紧的是,胡适的意见能够使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这个不能不问。比如对照大学,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制度应该怎样观照便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胡适也多次谈过。他在《书院的教育》一文中讲,书院的毁掉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因为中国一千年来的高等教育都在书院,尤其是书院的研究传统与精神更不易得。短视的革新家改书院为学堂,实际上毁掉了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制度,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胡适的这一意见表露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二十世纪念念不忘恢复书院的学者还大有人在,比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想恢复白鹿洞、鹅湖各书院。但他们远在台港,没有大陆的便利条件。像白鹿洞书院现在主要是一个文物单位,这样的人文利用率当然是很低的。其实现在来看,晚清废除科举显然是一个失误。因为不说别的,首先寄命于科举的人陡然一下失去了依托,无疑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and 不安稳因素。所以从过去的人文教训来看,加法原则应该是人文的首要原则。亦即:我们并不需要着意地废除什么,完全可以径直确立新制度;老旧的一旦失去了竞争力,自然会慢慢淡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缓冲带,给人群以回旋余地。况且有很多事物是不会过时

的,它的真价值只有在人类群体安静下来以后才看得见、看得清,所以保持不动到最后往往就是最先进、最优化、最主动。比如说中国的古城如果都不毁掉,那么现在一定能雄视世界,也不会滋生那样多的假古董。黑格尔说中国人不懂得自己的知识资源,难道败家也是一种国民性?

实际上,太学与书院的意义还不止此。因为太学与书院还构成一个对比主题,即太学代表官学,而书院代表私学。像朱子私人讲学,胡适也介绍得很清楚。这一官学与私学的对比,实际上是值得中国骄傲的传统。别的不说,就从这一历史游戏规则的准备来讲,已经形成了所谓最不坏的制约机制。我们不要害怕官学,以为那是代表某种淫威的东西。官方也应该有自己的学,谁都应该有自己的学,没人可以例外,我们总不想要一个不学的政府吧。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政,这是天经地义的。学什么,这才是关键。因为没有学,我们在近现代吃的亏还不够多吗?古代是以经史为学的,人文中如果说还有某种根基的话,都是靠这些来建立。而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由大学来包揽的。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新课题:今后怎么做?

胡适对历史教育机制虽然有遗憾,但他对现代教育的意见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适认为美国教育的成功一方面是有政府的提倡与合作,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间有以兴学为志业的人,所以美国能成为世界学府。这些意见虽然中肯,但我们不能不思考得更多一些。比如胡适讲到容闳不算很成功,这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没有民间努力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官方的支持,为什么很难做成美国那样的效果呢?恐怕最根源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国家。制度的建立并不难,制度建立以后的实做才是更为关键的。而是否世界性国家,对具体的实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知道,自海路开通以来,人类才真正进入国际世

界的生长发育。可以说,如果没有世界的拉动,欧洲根本不可能完成现代化,其资本主义至多停留在威尼斯商人的水平。所以,现代化国家就是世界国家。中国又想现代化,又总是拘泥于国别思维,逻辑上显然是不通的。民国初年,由于国家的起点太低,诸事未备,急需解决外围问题,一时囿于国别思维也倒罢了。但如果以后还是这样,显然是绝对落伍的。教育上的成绩,中美之所以有那样的差异,根本原因乃在于美国是世界国家,而中国是国别国家。国别国家的教育,肯定办不过世界国家。即使制度在同一直线上,实做方面也会拉开距离。一言以蔽之,国别不可能造成现代性,现代性就是世界性。国别性与现代性,是近现代史中中国悖论的关键。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国对自己的教育的优势是否了解。亦即哪些是落后的,哪些并不落后,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统计。比如文科学的情况,就不可能如何落后。因为中国是有着深厚文科学传统的国家,它只须维持历史中的一般水平就可以确立某种优势。因此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仍然是一个加法问题。亦即只需要将自己还没有或不擅长的领域补加进来即可;而且知识学问的优势的维系与保持主要靠研究的创发,而不是现成的学习。罗素当年来华也谈到,留学对于中国应该是一种过渡手段,今后一切知识门类的学习要做到都能在国内完成。而且他特别提到美国留学生的同化痕迹最为明显,实际上这正说明了真正的现代性的世界性的教育的优势与威力,这种效果决不是单纯书面古典的学问教育所能奏效的。胡适在教育思想上是很“美国主义”的,这大概正反映了罗素讲到的美国特点。老话说,做什么功夫在什么之外。学剑功夫在剑外,学书法功夫在书法之外,办教育功夫当然也在教育外。凡事都不是机械的。

说到这里,胡适关于技术教育的态度不能不提,因为它关系到实学。《在北平市立高工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中胡适表示职业

技术教育绝不比大学低,更不比高中低,这可以说是达人之见。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回想我们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如果不是感到升学进身无望,大家是不愿意读技校的。而实际上是:技术教育所需要和包含的知识能力,又岂是那几本呆板的书面教材所能比的!所以无论胡适所处的时代还是现在,要想国人真正推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还需要一番努力。中国的教育,因为首先是和生计利害纠结在一起,所以不能作太多知识上的要求。这一层胡适也谈到了,就是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就业情况都很好,而学文科的却很成问题。这是必然的,也应该如此。因为文科本身不能产出实际的财富,如果人多了,社会肯定养不活,所以搞文科的永远是人越少越好,否则无法安置,必然形成社会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所以只有人人都掌握一技之长,才能够人人有饭吃。胡适特别谈到犹太民族都是要学做工的,因为他们是千年流浪的民族,不这样无法生存。而这个传统又给这个民族造就了一大批人物。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国人都是要自己谋饭吃的,没有那么多官方体制养活人。很多人挟技走江湖,代代相传,形成不少世家。这些历史资源大多已经不存了。而技术教育的缺乏落后,直接导致很多领域可用人员的短缺。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能否主领世界、居先导地位,就看它的技术优势如何。没有任何一种主动的经济不是整体上以卖技术为归的,技术工艺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国家的关键因素。

技术教育需要工厂等设备,能够与社会达成供求对应的一技之长的教育应该成为国家办学的主导。以前不考虑市场情况造成的一批文科人,现在果然就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不作根本的、不二过的改变,以后更会尾大不掉。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人普遍都对文科感兴趣,并且还想兴趣与职业统一,如何协调呢?比如学化学的想搞戏剧艺术,对化学毫无兴趣,感到很痛苦(这不是杜撰

的),这类问题就很麻烦。胡适关于技术教育的意见是很明理的,他经常讲一些美国社会的成功人物,其中就有告诫国人一定要学做工的意思。当然话说回来,胡适关于文科教育的意见才是他的本业。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关于国学书目胡适有《答清华周刊》一文,实际上是压缩后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来胡适开列过一个很大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引起不少批评非议。其中梁启超还进行过争论,并拿出自己的书目方案。因为那些长文不太适用,所以这里没有选。《答清华周刊》里的国学书目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事实是,国学书目的问题乃是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民形态的定型。但是最初胡适、梁启超给出的书目之大,即使专门的文科学者也未必都能通看。更主要的是,二十世纪是中国最后的古典时代,所以民初的人们还关心讨论国学书目一类问题。但是二十一世纪情况就根本性地不同了,对古代的书人们再没有去读的强烈要求。这就是所谓人的代不同了,人是有代的。这么说是以笔者的教学经历为根据的,并非妄言。像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普遍对古籍没有兴趣,而且也不想培养兴趣。这与文革以前的人无论怎样禁止还要偷偷看书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事情有所谓好坏,事情只有不同,因为人文生活已经彻底地改变了。

《差不多先生传》是胡适写国民性的经典,其教育涵义不用赘言,所以这次也选了。我们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各个不同的学者对国民性的揭示首先是否和地域有关系。比如说胡适所讲的“差不多先生”国民性,是否与徽南的民性直接相关。正如鲁迅写国民性,首先可能是绍兴地方的民性。又如陈寅恪说中国的民性上诈下愚,好像是司马温公说过,闽人多诈。因此我们说学者谈论国民性首先是关于他们自己周围环境(或渊源)的民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比如山西学

者要谈国民性,首先可能是源于山西的民性情况,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中国区域广阔,各地的性质是不统一、不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在谈论中国的问题时很难一概而论,换句话说,对我们知识上的精确度的要求比前人只高不低,这是时代所决定、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时代,这是必须清楚的。“地球村”太狭小,人类以后必定向宇宙拓进。汉代开通陆路、明代开通海路,今后是开通天路的时代了。从“地球村”到“宇宙乡”,这是个必然的过程。人文教育当然要适应人类大趋向。我们只有从“跟上教育”一步到位地进入“自我教育”,才有望把握主动,因为跟随性的教育永远不可能养成独立的人才。在读胡适教育文章的时候,这一点必须注意。

胡适教育文章的选编我们已尽力为之,希望读者不要太过失望才好。

目 录

导言.....	季蒙(1)
---------	-------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1)
论大学学制	(6)
谈谈大学	(9)
考试与教育	(12)
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	(19)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24)
书院的教育	(28)
教师的模范	(29)
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学府	(32)
知识的准备	(34)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43)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51)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57)
在北平市立高工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59)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61)

选科与择业	(70)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77)
青年人的苦闷	(85)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90)
论学潮	(93)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98)
哲学史各班论文题目	(103)
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	(107)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110)
论中学的工具教育	(119)
小学及初中毕业应达最低限度的程度	(121)
英语教学问题	(125)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128)
怎样读书	(130)
答《清华周刊》	(134)
读经平议	(136)
八股的起原	(141)
致留美学界公开信	(144)
致北大同事公函	(147)
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	(149)
致汤尔和	(151)
致台湾某学术机构负责人	(153)
致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函	(155)
致太虚	(156)
致李由义等二十位学生	(158)

杜威的教育哲学	(160)
关于教育问题的答问	(171)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177)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	(182)
教育学生培养兴趣	(186)
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	(190)
学生与社会	(194)
为什么读书	(200)
新生活——为《新生活》杂志第一期做的	(206)
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209)
人生有何意义	(213)
工程师的人生观	(215)
不朽——我的宗教	(221)
差不多先生传	(230)
时间不值钱	(232)
少年中国之精神	(234)
纪念“五四”	(239)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249)
论中西文化(残稿)	(253)
学术救国	(258)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262)
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	(267)
拟“整理国故”计划	(271)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我对于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的学制系统草案,大致都很满意。陶行知先生要我把我个人对于这个草案的意见写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讨论的时期尤其重要,故我不敢推辞,就把我的几个感想,——或是赞同,或是疑问,——都写了出来,请国内教育家指教。

一、关于初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改小学七年制为六年制,废去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的名称,统称为小学校,但得分二期:第一期四年,第二期二年。这个改革把小学的年限缩短了一年。我想这一层有几层好处:第一,省出一年来,加在中等教育上去,使六年的中学制容易实行。第二,当此义务教育未能实行的时候,——后三年的实行更不知在何年!——缩短一年便可以减轻学生家属一年的负担。第三,有人疑心年限的缩短便是程度的降低。这是错的。小学改用语

^{*} 原载1922年2月《新教育》第4卷第2期,收入柳芳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教育文选》。——编者

体文以后,时间应该可以大缩短,而程度可以必不降低。但这个责任,课程与教科书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若把旧日古文体的教科书翻成了白话,就算完了事,那是决不行的。小学里用白话教授,教学的困难可以减去不少,教学的效率应该可以增加。若仍旧一课只能教“一只手;一只右手”,那就是大笑话了。

新学制关于初等教育,还有一个大长处。总说明第四条云:

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

又第五条云:

图之左行年龄,以示入学及升级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与成绩或他种关系分别入学或升级。

这个弹性制是现在很需要的。现在的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时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区别,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制限与埋没。当此七年小学制未废止的时候,我知道有许多儿

童可以不须七年的；将来六年制实行之后，也许有一些儿童还可以缩短修业年限的。当缩短而不缩短，不但耽误了天才的发展，还可以减少求学的兴趣，养成怠学的不良结果。

二、关于中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把中学的修业期限由四年改为六年，分作两级：前一级为初级中学，或三年，或四年，或二年；后一级为高级中学，或三年，或二年，或四年。中学改为六年，是很好的。但我有几点疑问。现在的中学，可算是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不全在四年时间之短，乃在中学教员之缺乏与教授之不得法。年限的加长并不能救现在中学的弊病。用现在办中学的人，不变现在的教授法，即使六年的工夫全用来教现制中学四年的课程，也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新制的六年中学，除了做完现制四年的中学课程之外，还要做完大学预科和高专预科的课程呢？现在单办中学，人才还不够用；将来办这些兼大学预科的中学，又从那里得人才呢？这几点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大学及各种高等专门学校皆不设预科，这固是我极赞成的。我常说，民国元年的学制把各省的高等学堂都废去了，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那是民国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为（1）各省设立大学的一点小基础，从此都扫去了；（2）各省从此没有一个最高学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的事业了；（3）大学太少了，预科又必须附在大学，故各省中学毕业生，为求一个大学预科的教育，必须走几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机会，岂不是太不近情理吗？试想四川、云南、贵州的中学毕业生必须跑到北京、南京，方才有一个投考预科的机会。